新时代背景下儒家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朱光磊,董颖洁[1]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摘　要]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儒家文化面对时代的要求需要做出新的传承与发展。一方面可以从儒家文化中汲取养分,传承其中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思想;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结合儒家文化的内在理路与新时代社会的现实需要,针对儒家文化中所欠缺的地方进行创造性发展,将儒家文化进一步与理性思维、辩证唯物主义精神相融合,打造新时代的文化传统。

[关键词] 新时代; 儒家文化; 传承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9)06-0036-05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创造了大量的优秀传统文化,它们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撑和价值源泉。这其中,儒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所在,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小到个人道德修养,大到治国之道,儒家文化形成了广大而精微的价值系统。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时至今日,仍对每一个中国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要矛盾具有了新的特征,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在新时代中表现出新的活力。一方面,我们需要传承儒家文化中固有的积极要素来解决新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融合新时代的新要求来创造性地发展儒家文化来迎接新时代的挑战。

一　新时代的理论特征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当今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走在世界前列,人民的物质需求基本得到了满足。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2 这一论断是适应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要求的,这一论断包含了以下 4 个方面的特征。

(一)新时代的发展应当以人民为中心

当今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虽发生了变化,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路线不动摇。十九大报告也对“以人民为中心”这一命题进行了阐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1]21 这要求我们必须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只有明白人民的需求才能真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

(二)新时代的美好生活需要应当由基础性向发展性提升

“美好生活需要”包括基础性的生活需要与发展性的生活需要。其一,基础性生活需要可以分为基本物质需要与基本精神需要,包括了人类基本的衣食住行和生育繁衍的需要;也包括了人对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的需要,如医疗、工作、教育保障等;还包括了人的社交需要、情感需要与精神文化需要。其二,发展性的生活需要即高级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即追求更高质量的物质产品,追求更高层次的社会环境、追求自我的价值与人生的意义。因此,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有两面的含义:第一,在基础性生活需要上由重量向重质进行转变,即人们

[收稿日期] 2019-04-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青年项目“先秦诸子社会治理的思想体系与理论判释”资助(编号:18CZX041)
[作者简介] 朱光磊(1983-),男,江苏苏州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1 苏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追求更高层次的物质服务与精神文化生活。第二,看重发展性的生活需要,人民在个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尊严权利、自我价值和社会的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稳定安全、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对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新时代需要解决不平衡发展的问题

“不平衡发展”主要表现在发展的区域、群体和领域差异 3 个方面。区域差异即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和城市地区较为发达,而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发展则相对欠发达。群体差异则主要表现为不同社会群体的贫富差距较大,虽然已经有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但至今仍有大部分同胞处于贫困状态,我国的脱贫攻坚的任务不容乐观。领域差异则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社会发展领域的发展不平衡,经济建设是跑得最快的一架马车,而其他几大领域发展则有不同程度的滞后,与经济发展之间仍有较大差距。

(四)新时代需要解决不充分发展的问题

“不充分发展”首先体现在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高上,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为了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而采取粗放型发展模式,消耗了大量能源与资源,付出了高昂的环境成本,但产品附加值却很低。其次,“不充分发展”还体现在我国整体科学技术水平发展仍不够充分,自主创新性成果相对落后。虽然我国在某些高精尖领域已处于世界前列,但整体科技发展水平不高,高科技产业所占的比重仍有限。再次,“不充分发展”还体现为精神文明发展不够充分而导致一些社会问题。比如,没有给予知识分子以足够的重视与相匹配的物质条件,许多教育工作者、科研工作者的收入远远比不上一些娱乐明星的收入。在当今社会,物质发展与精神发展不相协调的情况也非常普遍。

在新时代,我们需要在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前提下,进一步解决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的问题。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通过传承与发展自身来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

二　儒家文化的新时代传承

在新时代背景下,继承和弘扬儒家文化更能激发我们对传统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对其中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思想与内容进行恰当地借鉴与阐发,对于我们解决当今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有所助益的。

(一)德性创生: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

在儒家看来,天是具有超越性的,天具有绝对的道德精神,即“天理”。同时,儒家认为人先天具有与天相配的德性,这是人的先天禀赋,即“良知”。实际上,“天理”与“良知”只是一个,只不过是从主体性上说是“良知”,从客观性上说是“天理”。“天理”的存在只能靠人从心上感知,由此才能上通到“天理”。儒家主张,人的内心本然就具有一种超越的道德精神,并且在与物相接时,人的道德心在本然状态下自然会有成就万物的趋向,即“生生之德”。《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有言:“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2]2691 人之仁心与事物之直接相感通可见天理良心之流露,人只要发明本心,将其扩充发展即可成仁成德,正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章句上》)[2]2771,“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2]2479。这种德性精神由内而外,由己及人,在与家人、朋友、外物、天地相交接的过程中不断扩充以成就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在儒家看来,个人作为德性主体,不仅要自己不断修养以圆足自己的德性精神,同时也要在感通外物的过程中推进他人的生命进至仁的境界,由此开物成务、化育天地。简言之,儒家的德性精神最终总是要成就天地万物的。

在当今新时代背景下,在新的社会主要矛盾面前,儒家开物成务的德性精神可以表现为以下 4 个方面。其一,以民为本;其二,富民教民;其三,均民产业;其四,大同理想。此 4 个方面正好与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所表现的 4 个特征相匹配,从思想文化上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做出贡献。

(二)以民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儒家文化理念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一点上,儒家的民本思想与之有相通之处。我国最初的民本思想滥觞于商周时期,早在《尚书》中就已经可以看到相关记载,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2]156、“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周书·泰誓上》)[2]181,都指出了人民的重要性,人民是国家安宁的根本,人民的需求要听之足之。而商周时期的民本思想也为儒家所继承,成为儒家政治哲学中重要的理念。在《论语·颜渊》中,子贡向孔子请教治国的办法:“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期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2]2503 在孔子看来,统治者对于人民的信义是国之根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即使牺牲经济与国

防,也要取信于民。孟子同样也主张以民为本,正所谓“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章句上》)[2]2721。在孟子看来,统治者应当顺应民意,而要想得到人民的支持,就要视民如己、同民好恶。可见,儒家以民为本的思想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不谋而合,为现代理论提供了重要的传统资源。

(三)富民教民:满足美好生活需求的儒家文化理念

儒家以民为本的思想落实到具体措施上,一方面要“富民”,另一方面还要“教民”。“富民”即在经济上要藏富于民。正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2]2503,只有人民富足才会使国家富足,而要使人民富足,儒家认为需要采取为民制产、减轻徭役赋税等手段来实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章句上》)[2]2768、“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2]2667。“教民”则是在满足了人民物质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人民的精神发展,提高人民的道德文化修养。《论语》中有一则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2]2507 孔子认为,“富”是“教”的基础,只有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保障,民心才会安定,才能进一步实行道德教化。孟子也有类似的表述:“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孟子·梁惠王章句上》)[2]2671 人民的物质生活富足后,要“驱而之善”,要引导人民的精神生活向好的方向发展。而“教之”的具体内容则是儒家所提倡的伦理道德,如“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章句上》)[2]2666、“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孟子·梁惠王章句上》)[2]2667。总之,在儒家看来,既要保证人民富足安定,同时也要强调人民个人的道德修养,落实以民为本的思想就是要满足人民在物质与精神上的需求,这与新时代背景下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要求是基本一致的。

(四)均民产业:平衡发展的儒家文化理念

当今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发展不平衡,社会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过大。而儒家对贫富差距问题则早有认识,在物质极不发达的几千年前孔子就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2]2520 的观点。所谓“均”,就有公平的意义。这里所说的“均”涉及到社会财富分配公平的问题。朱熹对此注曰:“均,谓各得其分。”[3]首先,“均”并不是指平均,不是指所有的社会成员完全绝对平均地占有财富,而是“各得其分”,即应当按照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的多少来分配财富,使每个人各有所得。其次,“均”虽是各得其分,但同时也要求公平,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也是一种不公平,这也是要反对的。孟子就曾猛烈抨击过悬殊的贫富差距现象:“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2]2667 此外,不平衡发展还体现在物质领域与精神领域的发展不平衡,当今社会物质文明已经高度发展,但精神文明发展相对滞后。而在几千年前,孔子虽身处物质贫乏的时期,但仍要求精神生活的平衡发展,他主张“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2]2475,即各人都能得其所在,获得他所应得的社会上的精神关爱。总之,儒家文化中的这些内容时至今日仍对于我们促进社会的平衡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五)大同理想:充分发展的儒家文化理念

当今社会还面临着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一方面,物质文明虽然发展快速,但并不能充分体现在民生应用上,尚待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精神文明相对滞后,与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不相协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儒家德福一致的观点中汲取养分。儒家承认人与人之间有等差之别,但儒家并不局限于此,而追求推己及人的德性扩充,即不断扩充自己的德性以影响他人、家庭、社会、国家,最终促进天地的化育,达到精神与物质的全方位发展。因此,儒家之“德”的理想状态即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德性精神,而与之相匹配的“福”的理想状态即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至福。大同社会的德福一致也是儒家所追求的至高理想状态。在这个社会中,人人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礼记·礼运》)[2]1414。在大同社会,精神境界得到了充分的提升,财力物力也有了充分的发展,人民也获得了最大的幸福感。在追求德福一致的充分发展的过程中,德的追求相对于福的追求具有优先性,正所谓“夫德,福之基也,无德而福隆,尤无基而厚墉也,其坏也无日矣”[4]。儒家的德福观念对我们解决当今社会上的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具有重要启示。物质的长久繁荣有赖于道德的根基,要想构建幸福和谐社会,必须要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以促进社会的充分全面的发展。

三　儒家文化的新时代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时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不断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5] 因此,在新时代,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的儒家文化既需要继承,也需要发展。如果说继承是针对儒家文化中固有的精神进行延续,那么发展就是针对儒家文化中所欠缺的地方进行创造。这些创造主要表现为两个方向:其一,儒家文化需要进一步与科学技术相融合;其二,儒家文化需要进一步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科学技术因西方工业革命而有急速的发展,成为现代性的显学,任何融入现代性的思想文化都需要与其进行理论的融合。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现代性的自由主义社会制度批判上的理论学说,也是我国历史与人民的选择,成为我们建党立国的基本指导思想。这两个方向是儒家文化本身不固有的,却是现代中国人所必然经历的文化状态,故儒家文化的新时代发展必然需要融合这两个方面的内容而做出新的创造。

(一)儒家文化融合知识理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

儒家文化与知识理性、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具有两个方面的条件。其一,儒家文化本身就含有知识理性思维与辩证唯物主义精神。技术是科学的运用,科学是知识理性思维的成果,故科学技术的根本在于知识理性。先秦儒学中的荀子思想已经具有自觉的知识理性精神。他可以客观地论述纯粹的概念,并逻辑地演绎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只是这种知识理性精神被更为盛大的道德理性精神的光芒所遮掩而显得不那么突出而已。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西方天主教传教士来华而在明清之际的儒家士大夫中产生的逻辑学、几何学的新认识,无不具有浓郁的知识理性的特征。辩证唯物主义通过人类实践而发展物质基础从而不断解放人的自由的精神也体现在儒家传统中。先秦时期的孔孟思想都主张治理社会需要先从满足老百姓的物质基础为初始,而荀子揭示出了天地自然与人性中的物质属性,并极力主张通过知识理性与后天实践来对之进行创造性的改造与发展。这种提升物质需求、促进精神发展的实践旨向融入了后世的思想发展中,故中华文化永远保持着积极的入世倾向,并始终认为超越的精神理想必然不能脱离世俗物质世界而单独存在。其二,儒家文化的近代开展已经在融合知识理性思维与辩证唯物主义精神上做出了较大的成就。在中国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强大与侵入打破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开眼望世界,吸收西方的先进思想与文化。吸收西学主要有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中国人仅仅从船坚利炮上学习西方,由此路径进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最终可以达至知识理性层面的觉醒。然而,科学技术与知识理性是人对世界进行客观架构认识的一种样态,虽然能够促进物质发展,但始终不能解决人生问题。第二条路径,中国人开始吸收西方的社会体制与政治思想,从而打破旧有的帝制并逐渐完善新的社会制度。最终,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思潮一直在进行互动融合。那些主动学习知识理性与共产主义的思想先驱们本身都是儒家文化所熏陶培养出来的知识精英,他们能够看到儒家文化的不足,而主动学习新的思想来做出新的文化融合。我们就以儒家文化领域中的学者为例,牟宗三先生提出了“良知坎陷”之说,建立了从道德理性到知识理性的生成路径,在儒家文化的德性精神中容纳了知性精神,从而为科学技术奠定了中国式的道德形上学基础。侯外庐先生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研究了中国思想史,给出了中国思想史的唯物主义研究范式,而冯友兰先生晚年新编的中国哲学史,则又是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的研究巨著。

(二)儒家文化与知识理性的融合方向

儒家文化提供了一整套的人生价值与实践方向,而知识理性本身并不提供真正的人生价值,而仅仅是一种形式化的、客观化的逻辑思维。这种逻辑思维的意义在于,可以厘清认识对象的内在客观结构以及外在的客观关联,可以发现事物运行的客观规律。在这种规律认识的基础上,人可以利用这种客观规律来满足人的需求。人的需求是一种价值,科学技术是一种手段,手段是中性的,可以服务于任何一种价值。儒家文化与知识理性的融合,就是希望知识理性能够作为工具服务于儒家文化所给出的人生价值。从新时代背景上看,发展的平衡与充分的需求就体现了一种人文价值。这种价值如何实现,就需要科学技术手段的保证。一方面,利用自然科学的规律来进行充分的物质生产,极大地提高生产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优质服务,从而促使人民群众的需求得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利用社会科学的规律来进行社会治理,建立起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为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制度保证,从而促使人民群众的需求得到平衡发展。

(三)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方向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一样,都具有整套的人

生价值与实践方向。而且,两者的人生价值与实践方向并不具有绝对的冲突性,而是具有极大的互补的可能。我们不能用以往苏联教科书的模式来看待两者的差异,而是需要从两种文化的根本意旨上看待它们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的根本旨向在于通过人类劳动而促进生产、改造世界,让人的精神从物质世界的束缚中不断地解脱出来,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实践、物质生产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路径,而自由王国、人的全面发展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奋斗目标。基于上述判断,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可以从奋斗目标与方法路径上做出积极的探索。

在奋斗目标上,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具有极大的共同点。马克思主义作为自由王国的共产主义社会与儒家传统的大同社会具有类似的精神追求。两者都是物质发展充足,精神生活与道德意识都有极大的提高,人都做到了全面发展。而为了达到这种的理想目标,我们在新时代设立的解决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阶段性目标就是平衡发展与充分发展。应该说,平衡发展、充分发展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关键点。这个关键点,既为马克思主义所承认,也为儒家文化所承认。这种奋斗目标的相同,是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的理论保证。

在方法路径上,马克思主义从物质基础上着手,希望通过物质基础的发展而摆脱生产关系对人的束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儒家文化从精神觉醒上着手,希望通过德性精神的自觉而亲民爱物,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两者初看起来似乎有所不同,其实仍旧具有关联之处。从马克思主义来看,人的劳动实践,不但改造了人的物质世界,同时也改造了人的精神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中,从根本上说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第二性的,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物质第一性与意识第二性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人的劳动实践必然有精神意识的指导,这时精神对于物质生产就具有极强大的能动作用。我们提倡的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生产服务尽心尽责的工匠精神,都是精神意识能动作用的体现。而这种公仆精神、工匠精神也是儒家文化所极力提倡的德性精神。从儒家文化来看,人的德性扩充,不但要在精神上感化他人的德性觉醒,更要提高他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因此,致知与格物是一体的,良知的道德意识必然需要体现在对物质世界的纠正与完善上。而对物质世界的纠正与完善,又是马克思主义所极力提倡的生产实践。对照此两者,我们可以看到在方法路径上,虽然两者有侧重点的不同,但能够在彼此的文化系统中合理地解释对方的学说宗旨,故而两者应该能够更好地做出进一步的理论融合。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 [清]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宋]朱 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170.

[4]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 国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22.

[5] 习近平.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J]. 党建,2014(10):1.

Research o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Cul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ra

ZHU Guang-lei, DONG Ying-jie

(*Soochow University*, *Jiangsu* 215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s facing Chinese society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people's 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nd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Confucian culture needs new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face of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On the one hand, we can draw nutrients from the Confucian culture, and inherit the idea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the New Era.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 combine the inner rationality of Confucian culture with the real needs of the new era society, combine Confucian culture with rational thinking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o create new cultural tradition of the New Era.

Key words: New Era; confucian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